

文史學家

蒙文通傳奇

● 王培堯

隨伯父至省城讀書

蒙文通名爾達，字文通，以字行（一八九四—一九六八）近代文史學家，四川鹽亭人，一八九四年十月生於鹽亭縣北的金頂場。其父蒙君弼為清代廩生，精通儒學，望重鄉里。蒙文通自幼聰慧，五歲入學塾受教，遍讀四書五經兼及諸子，兩年後多能背誦。他的伯父蒙公甫（裁成），熱心地方教育，在綿竹縣任教諭，倡導新學。一九〇三年蒙文通至綿竹，就讀縣立高等小學，一九〇六年，蒙公甫轉任成都府教授，他亦隨至成都，進入四川省城高等學堂附屬中學讀書，該學堂由清翰林院編修胡峻任總理（校長），中學部由劉士志任校長，聘有教師楊滄白、謝無量、劉豫波、徐子休、朱青長等人，學術文章

，知名於當時，學堂訂立的教育方針是「以中國經史之學為基礎」，培養專才。中學部為高等學堂學生來源，所以高等學堂教師也在中學部授課。蒙文通就讀中學部時，同班同學有大陸建政後的中國科學院院長、文學家郭沫若、王光沂、周太玄、魏時珍、曾琦等人，後來均各有成就，郭沫若與蒙文通在中學部同一課桌，朝夕相處，課餘同訪書肆，搜求愛讀之書。蒙文通購得「輶軒語」、「書目答問」、「四庫提要」等書，開始對先秦學術至漢、宋時代的發展脈絡，嘗試作新的探索，從而進窺文史之學的堂奧。

研究論文初露頭角

一九一一年，蒙文通經選拔進入四川存古學堂，這個學堂是四川提學使趙啟霖

仿張之洞的湖北存古學堂於一九一〇年創辦的，辦學的宗旨是「保存國學，尊重蜀賢」，學生要求的水準甚高，係由舉人、貢生及新學堂畢業生中擇優選拔，教師均為名家宿儒。辛亥革命後，這個學堂改名為四川國學院，由謝無量、劉師培、廖平（季平）、宋育仁先後出任院長，蒙文通在校經多位大師調教，學業精進，一九一四年所撰研究論文「孔氏古文說」，論述精闢，由老師廖季平推荐给「國學叢編」刊載。此文辨舊史與六經的區別，探討今古文的源流，是後來他的「經學導言」及「經學抉源」兩專著問世的先聲。

一九一八年，蒙文通完成學業，自成都回到鹽亭，在故里整修破廟，開始辦學，教育鄉親子弟，開啟讀書風氣。一九二一年，其伯父蒙公甫任重慶聯合中學校長

，蒙文通應邀執教，並在重慶第二女師兼課。此時正值「五四」運動，新思想、新文化在四川開始傳播，二女師有學生展開「擇師運動」，反對不稱職的校長和教師，以致校園動盪，長期不能上課，這年十月，蒙公甫接長二女師，受到學生熱烈歡迎，恢復課業秩序，蒙文通隨之任教二女師，培育了不少女子專才。

討論學術訂交錢穆

在重慶任教期間，蒙文通在友人蔣錫昌處讀到錢穆在蘇州第三師範校刊上發表的「先秦諸家論禮與法」，認為旨意宏豐，遂工楷寫了封萬言信，寄給錢穆，此為兩學人友誼一生的開始。

一九二三年，國內學術界發生古文之爭，各擁前人說法，論戰激烈，莫衷一是。章太炎、康有為之間，各樹旗幟。有鑒於此，蒙文通遂離開重慶，南走吳越，訪求時賢，欲探討同治、光緒以來經學的流變。到南京後，曾拜謁章太炎，與他談古、今之變。後得識歐陽竟無大師，探問唯識法相之學，深感以治經之法以研佛典的重要，遂入歐陽大師所辦「支那內學院」，潛心研習佛家哲學。在院內與同窗好友

湯用彤、熊十力、呂澂、王恩洋等朝夕相處，談古論今，相得益彰。蒙文通所寫研究論文「中國禪學考」、「唯識新羅學」，前篇探討達摩前二十六祖的不足，并辨析古禪、今禪的異趣；後篇論玄奘以後唯識之傳，窺基、圓測本自不同，窺基之說行於中土，圓測之說盛於新羅。皆深得歐陽竟無的讚賞，特將前篇刊於院刊「內學」創刊號，緊接於歐陽自講《佛法》、《心學》二文之後。

一九二七年，蒙文通由南京返川，執教成都大學，一九二九年復應歐陽竟無之約，再赴金陵，執教於中央大學。翌年再返川，於成都大學主講經學，當時的校長張瀾提出「打開夔門，歡迎中外學者來川講學」的響亮口號，用人唯才，重金禮聘，到校任教的名教授除蒙文通外，有楊伯愷、熊曉岩、吳芳吉、吳虞、伍非白、魏時珍、曹四勿等人，極一時之盛。

一九三一年，四川軍頭移辦學經費充當軍費，強將成都大學、成都師範大學、四川大學合併為國立四川大學，蒙文通反對軍頭摧殘教育，憤然離開成都，赴開封，任教於河南大學，在河大講學與研究中，為文闡述周秦兩漢學術思想的變遷，指

出秦行法制，推行先秦法家思想；孔孟所述為周制；漢代經師之說非周、非秦，實漢儒之理想。又曾寫「天問本事」以探討先秦荊楚文化的本源。

一九三三年，他應湯用彤之邀，由開封赴北京，教授於北京大學，與錢穆同執教於史學系。他主講周秦民族史、魏晉南北朝史和隋唐史。

撰越南古史駁謬說

一九三六年，日寇侵華日亟，東北陷敵，華北危殆，蒙文通移居天津，任教河北女子師範學院，若干學界敗類鼓吹「中日提攜」，誘他撰寫此類文章，為其所扼。翌年，盧溝橋事變起，京津陷落，蒙文通避入租界，旋攜家由塘沽浮海南返。

返川以後，他仍任教四川大學，先後寫成「周秦民族史」、「中國史學史」、「古地甄微」、「儒家政治思想之發展」、「墨學之流變及其原始」等專著及論文。抗戰勝利後先後任教於華西大學、東北大學（遷川）。一九四〇年應四川省教育廳廳長郭有守之邀，出任四川省圖書館館長。

中共建政以後，蒙文通執教於四川大

中學、華西大學，兼任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兼學術委員，撰寫「越史叢考」一書，駁斥陶維英所著「越南古代史」，指越人曾居長江流域之謬說。這本書他參考了一百三十餘種古代文獻，從十二層面考證分析，說理充分，證據明確，全書貫穿著愛國精神。

一九五七年，湯用彤任北大副校長，

湯氏在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會第二次會議上發言：中國科學院應協助國家規劃委員會，迅速了解每門學科學者的專長，認真組織各方面的力量，以保證十二年科學規劃的完成。他說：「現在很多人知道蒙文通是個中國史學家，並且是個上古史學家，但很少人知道蒙先生在中國思想史方面也有特長，因為研究中國思想史就離不開經學和佛學。蒙先生既是經學大師廖季平的學生，又是佛學大師歐陽竟無的學生。此外，他對唐宋思想史的發展也極有研究，特別注意了過去向未被人注意的那些思想家。」

湯用彤對蒙文通知之甚稔，所以能一語道破他的成就，蒙文通治學，是由經入史，經史貫通。他對歷史的研究也貫穿經學思想，沿經學上究古史。

蒙文通常說：「講經這門學問，明注是一步，明傳是一步，明經是一步，明道是一步。若還只在前三步裡邊，才算做得一步，不能做明道的學問，那還難以說是一個經學家。」他所謂「明道」其含義頗合儒家「內聖外王」之功。儒家「內聖」，是講身心性命的學問，亦即思想境界；「外王」是治國平天下的道理。

蒙文通的經學思想，後來明顯地反映在他史學研究之中。他後來所撰的「儒家五論」一書，對儒家政治思想、哲學思想發展，對儒墨的匯合，對周之商業，秦之社會，漢之經濟政策，都能以經治史，經史貫通。

蒙文通長於經史，又精研佛學。

據楊向奎回憶，有一次他問蒙文通：

「先生，您從廖季平學經，從歐陽竟無學佛，曾問學於章太炎，三大師您都親炙。您說，就影響說，就成就說，三先生孰高？」

蒙文通不慮而答：「歐陽竟無。」

蒙文通這樣回答是從思想境界而論，

佛遠於經，而今文又遠於古文，故有此答。但這也是他對歐陽大師佛學的極高崇敬。在南京內院學習時，歐陽大師對蒙文通

極為器重。每當蒙文通離開南京，他總是常函詢，深寄其意。茲將手邊所存歐陽竟無函稿摘錄於下：

孔佛通，通於此冊。……唯我文通，始足與談。孔學，聊發其端，大事無量，甚望我弟繼志述事，奈何經年不遺我一字！

當時歐陽竟無正主持改印《中庸傳》

，先寄給蒙文通，并在信中說：

改好刻印竣，先寄此。此唯我弟能知，個中人談個中事，欲其速達也。數年不見，又改就茗事。何時西窗燭，共作刻入談。余老矣，風燭龍鍾，半空霹靂；精神肌肉，與境奪盡；全恃觀行，一絲九鼎；繼續大難，德孤鄰寡，亦可悲矣！

函中所見，師道之尊，師生之情，字裡行間無不流露。望志述事，期望甚殷。

師事歐陽竟無習佛

廿年代，蒙文通、熊十力、湯用彤同受教於歐陽竟無。前幾年，北大教授湯一介搬家時，發現五十年前蒙文通致其父湯用彤的一封信，信中論及佛儒哲學思想的滲透，很有價值，摘錄如下：

「弟刻住內院，擬將來欲作之文，

一一作成。就中尤要者為《周秦之民族與文化》。去夏，聆先生論南北朝與唐之佛法，而及于唐之治術、學術與北朝之關係，並其血統與北朝之關係，於是作《南北統緒論》。去秋寄呈一篇，想先收到。茲擬題目為：《秦為西戎》、《西戎北狄之遷徙》、《周時漢族之南遷》、《西北民族之思想與法家》、《秦漢政治與法家》、《荀子與法家》。大意以儒家為周之政治思想，法家為戎狄之政治思想，法家實一異民族與漢族接觸而發生之新變化。荀卿之《天論》、《性惡論》，實西北思想之中心，為法家之最高理論，與東方儒、墨、陰陽之根本思想相衝突。周秦間百家之學，實以法家、名家新興之學與儒家舊學為主潮，而諸子百家為餘波。儒家以復周之舊為主；法家以變周法後為主；道家則既非從周，又無新制，而欲復之無為之治，此為南方民族之態度與思想。

竟公令弟作一《中國哲學史》，此事體大。擬先從史說入，以見周秦之哲學根本，從民族說到思想與文化。與章太炎、柳翼謀、景繆諸兄皆談過，竟師、伍非白亦贊此說。各題作成合為一冊，殆六七萬言，使稍有當。幹學問之事皆先生論六代

佛法啓之也，略陳大意而已，不克詳言。願先生與證剛、子真兩先生有以教之。

《破破新唯識論》已收到。禍結兵連，患無時已，而學術實被其殃。……子真先生病已大瘳耶？非常繫念，……俟此數文作畢，日禍稍弭，或仍北來相就也。」

錢穆師友憶蒙文通

一九八三年，中國文化大學華岡教授錢穆所寫「師友雜憶」一書出版，書中詳細記述了由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六年和蒙文通、湯用彤（字錫予）、熊十力在北大的教學生活及他們的友誼，介紹蒙文通的部分摘錄如下：

是年暑假（按：指一九三三年），蒙文通又自開封河南大學來北大，與余同任教於歷史系，錫予在南京中大時，曾赴歐陽竟無之「支那內學院」聽佛學，十力、文通皆支那內學院同時聽講之友。文通之來，亦係錫予所推荐。文通初下火車，即

來湯宅，在余室，三人暢談，竟夕未寐。曙光既露，而談興猶未盡。三人遂又乘曉赴中央公園進早餐，又別換一處飲茶續談。及正午，乃再換一處進午餐而歸，始各就寢。凡歷一通宵又整一上午，至少有二

十小時。不憶所談係何，此亦生平惟一暢談也。

自後錫予、十力、文通及余四人，乃時時相聚。時十力方為新唯識論駁其師歐陽竟無之說。文通不謂然，每見必加駁難。論佛學，錫予正在哲學系教中國佛敎史，應最為專家，獨默不語。惟余時為十力、文通緩衝。又自佛學轉入宋明理學，文通、十力又必爭。又惟余為之作緩衝。

又一次，則予與錫予、十力、文通四人同宿西郊清華大學一農場中。此處以多白楊名，全園數百株。余等四人夜坐其大廳上，廳內無燈光，廳外即白楊，葉聲蕭蕭，淒涼動人，決非日間來游可嘗此情味。余等坐至深夜始散，竟不憶此夕何語。實則一涉交談，即破此夜之情味矣。至今追憶，誠不失為生平難得之夜。

除十力、錫予、文通與余四人常相聚外，又有林宰平、梁漱溟兩人，亦時加入。惟兩人皆居前門外，而又東西遠隔。漱溟又不常在北平，故或加宰平或加漱溟，僅得五人相聚。宰平與漱溟則不易相值。

某日，適之來訪余。余在北平七、八年中，適之來訪僅此一次。適之門庭若市，而向不答訪，蓋不獨於余為然。適之來

已在午前十一時許，坐余書齋中，直至午後一時始去，余亦未留其午膳。適之來，乃為蒙文通事。適之告余，秋後文通將不續聘。余答，君乃北大文學院長，此事與歷史系主任商之即得，余絕無權過問。且文通來北大，乃是錫予推荐。若欲轉告文通，宜以告之錫予為是。而適之語終不已。余曰，文通所任，乃魏晉南北朝及隋唐兩時期之斷代史。余敢言，以余所知，果文通離職，至少在三年內，當物色不到一繼任人選。其他余無可言。兩人終不歡而散。文通在北大歷史系任教有年，而始終未往適之家一次，此亦稀有之事也。

文通既不續聘。史系主任遂邀余任魏晉南北朝史，余拒不允。余言聘約規定余只任上古兩漢，不願再有增添。其隋唐史一門，則聘陳寅恪兼任，上堂僅盈月，寅恪即辭去不再來。謂其體弱，其夫人言，若不辭去北大兼職，即不再過問其三餐。于是此課遂臨時請多人分授。學生有發問者，謂此課既由多人分授，何以獨不有錢某來上課。史系主任始來請余。余遂亦上堂一二次。文通自離北大，即轉至天津一女師任教。其家仍留北平，與錫予及余諸人之來往則一如舊日無變。

由錢穆的回憶中可以看出，蒙文通和平寡交遊，而式好無尤，文通為二三知己熊十力在探討佛學及宋明理學時，常有爭議，但兩人的友誼卻與日俱增。多年以後，蒙文通曾自稱：「諸學之中得之最深者為理學，然而罕與人論及，蓋以寡能相契也，惟黃岡熊十力，雖議論不能盡合，獨能莫逆於心。」而熊十力後來也說：「生

聖文叢書

無所不談札記

邵鏡人著 定價新台幣壹佰捌拾元

本書係邵鏡人教授繼同光風雲錄之後又一精心傑作、要目有：無所不談札記、憶昆明、一代學人柳詒徵、項羽新傳、感懷于右任先生、袁世凱的悲劇、民初政壇秘辛、蜀中遺老趙熙、五卅慘案回憶錄、丘逢甲之忠義與詩才、清代江蘇兩賢哲、梁鼎芬的風範、近代兩位奇人譚嗣同與唐才常、天才詩人黃仲則、樊增祥與易順鼎、王國維其人其學、民主運動的新階段、一代學人陳含光、南吳北齊兩畫家等篇、內容精彩、篇篇可讀歡迎讀者購閱。定價新臺幣壹佰捌拾元，中外訂戶八折優待祇收一四四元，書款交郵撥○七三九三三一二號聖文書局帳戶，立即寄書。